美国清史研究近况述评

（美国）艾尔曼

近三十年来，中国以外地区对于清代历史的研究发展得很快。特别是美国，近二十年以来，清史引起不少争论。例如，帝国中国末期在世界历史上何以由十六世纪之先进演变到十九世纪之落后？又儒家思想在明清历史发展中之作用是否积极性的、创造性的？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定论。在这篇文章里，笔者想先简要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中国史研究情况，再提到清史研究近况有关的问题。因篇幅关系，只能说明几个主要趋势、而不能介绍所有的重要研究贡献或研究题目。其它问题的探讨也需待之来日。

一、战后时期的主导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了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而成为太平洋强国之一。战后，因需要理解日本及中国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美国政府开始支持亚洲有关的语言学习及专门研究工作。各大学中原有的中国有关科系和课题的设置、战后因政府的提倡政策而发展得特别快。一般而言，美国的中国研究机构，到了一九六〇年左右，已经赶上西欧和苏联的中国研究所，而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他们的研究成绩。

美中双方的学术界到了最近才有机会交换意见，相互学习。由于长期的隔阂，美国和中国的学术立场必然有很多不同之处。不过，在美国历史界、中国学术界所强调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历史却也受到了相当的注意。无论是学习清代思想史或是新儒学之正统问题，美国学者免不了分析明清社会背景及经济发展。例如儒教问题，据耶鲁大学的芮玛丽教授一九五七年所提出的主要论点：儒教政治立场基本上和现代化水火不相容。因芮玛丽教授观点的影响，儒教在美国清史研究中，不但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与社会、经济结构有不可分的关系。

伯克利大学的勒文森教授继续了这个论点，而总结自己多年的研究工作来说明儒教的现代命运。在勒文森教授的分析当中，很容易看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的影响，不过也并不一致。勒文森进一步解释儒教和现代化水火不相容之处，指出现代化和学术专门化，尤其是科学专门化，有密切关联。儒教由于缺乏扩张力量且保留过时的文人理想，因此不能支持现代化最根本之需要：学术和社会之公开专门化。例如，提倡自强的清末官员，虽稍微理解“中学”和“西学”之不同作用，但他们的“体用”辩论，据勒文森的分析，实反映了他们仍不够彻底明白当时之专门化的必要性。

一九七〇年美国清史研究范围不断在扩大，以往比较薄弱的方面也开始出现成果。研究新儒学的美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反对上面介绍的立场，而认为儒教传统有它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早就批评美国学者以西方现代化角度来说明儒教的落后处。据狄百瑞教授的观点，新儒学最积极的贡献是它的自由主义传统。帝国中国虽利用程朱学派支持一种专制政治结构，但新儒学在社会上的作用超过政治方面的利用。从狄百瑞教授的立场来看，忽略中国传统的优点、而专门注意儒教的缺点，引起了一种根本误会，同时使美国学者过分的强调西方冲击与中国现代化之关系。据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的看法：我们应承认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因素，也是东亚文明之体现。

自从英国李约瑟教授“发前人所未发”之研究贡献以来，有些美国学者开始给与中国前近代一个重新评价。比方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文教授，继续研究中国传统科学史之工作，而说明了中国明清晚期科学的恢复和成就。数年前，西方学者仍认为受到西方冲击以前，中国根本上没有什么科学史，现在的态度则完全改变了。据李约瑟及席文的考察，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至十五世纪仍算比西方国家前进；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现代科学革命在西欧先进国家爆发，而引起了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据中国的王宏钧先生的说法：“这段时期便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由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由此可见，太注意十九世纪的西方冲击，而忽略明清帝国之积极和消极性的政治、经济要素，结果便使历史家误解中国的长期历史发展之限制所在。

此外，研究中国历史之美国学者也受到日本研究中国史的成果之影响。自从京都大学的内藤虎次郎教授提出了所谓唐宋朝之“近世论”以来，有不少美国学者接受这样的论点而运用它来分析宋明历史。京都学派的岛田虔次教授以内藤先生之“近世论”为基础，解释晚明的激进主义和中国近代思想之挫折；晚明思想虽未成熟，但王阳明的泰州学派从许多角度来看，很像欧洲的开明思想家，由此可见，晚明思想已相当前进。岛田先生的观点，在美国汉学界受到相当的重视。

东京大学的中国历史及思想史研究所给与美国学者之贡献也不少。东京学派所强调的明清社会历史，尤其是清初之地主制与农民支配问题，及重田德教授著名的“乡绅支配论”，在美国清史界都引起某种程度的反应，而有许多学者从农业、手工业、商业等不同之生产部门，深入分析清代经济状况。在思想史方面，东京学派之山井涌及沟口雄三教授企图引用明清之社会和历史上的发展，解释明末清初之经世致用思想与考证学之兴起；他们的研究成果最近也影响到美国学术界。

以上是美国之中国史研究的概略背景，接着介绍清史研究近况及其趋势。

二、清史近况研究

由于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和他的学生之影响力，“西方冲击论”仍然在美国清史研究界占着支配地位。不过，这几年以来，有些研究清史的学者，已开始企图重新认识“西方冲击论”之中心地位问题，而引起了一种修正运动。哥伦比亚大学的梅林·西林《知县的银两》、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威廉·罗文《汉口》、及笔者《从哲学到语言学》等，分别在清代政治、经济，及思想史各方面，批评了以“西方冲击论”为主的学习态度和方法，而对清史诸问题有不同的解释。此外，在史学方法论层面上，卫斯理学院的史扶林《中国历史的发现》也指出了“以中国为主”来分析帝国中国晚期历史之方法。

虽然不能否认西方帝国主义对晚清历史的影响，然而此一作用有其方法论上的局限。如想理解帝国中国从一五〇〇年至一八〇〇年如何从先进到落后，只分析外在的原因实在不够，内在之因素也得加以考虑。若能更广阔、更深入的探讨清代内在及外在的历史要素，学者便能进一步理解，十九世纪之西方冲击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历史的影响，有其一定的范围和解释力量上的限制。

此外，由于美国历史界的“区域分析”的研究倾向，清史界强调利用具体的地方文献资料，学习明清时期的地方现象；甚至美国清史研究最近也包含了人类学的方法论及研究成果。例如，史丹福大学的斯金纳教授运用了区域分析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解释各地区的经

济周期和有关的社会状况。从很多层面来看，明清地方社会秩序实依靠地方绅士社会地位来维持，有权力的地方家族和中央政权常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美国清史专家认为，学习中国的宗族和传统的宗族结构有助于解释帝国中国的地方社会如何运作。由于江南有关的方志及家谱特别丰富，这一带的社会秩序及内在矛盾乃受到研究者更多的注意。

另外，还有许多学者从政治层面深入研究清代的政府组织和具体作用。由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台湾的故宫博物院的清代文献档案开放了，美国学者乃能进一步研究清代政治制度史。如科举制度与君主集权有何关系？军机处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康熙和雍正皇帝建立秘密建储制度，在政治结构方面有何作用？是否为加强集权而设？诸如此类的研究题目引起了美国清史学界重新认识和评价传统中国政府的具体适应及它的地方限制。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韩书教授《一千年以来的中国叛乱》也利用档案的资料说明农民起义在清代政治和社会上如何发生及结束。

最后，笔者想提到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评价。自从乾隆时代以来，帝国中国晚期学术思想史上便有所谓“汉学”与“宋学”之争。由于门户之见，过去清代思想史曾被讥讽为“烦琐而了无建设性的版本学评鉴者”。此外，因清代思想最后导致满州异族的高压政策，过去的学者认为在哲学方面清代似乎没有丝毫的贡献。而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则认为以上的观点有其夸张之处，他认为思想史的发展虽受到外在环境的冲击，但思想史也包含它自己渊源，并显示了它的“内在发展的逻辑”。由于以前太过分注重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外缘，而视略了它的内在因素，乃导致“乾嘉学派”的学术贡献被草草了结。

因余氏的影响，所谓“清代儒家知识主义的兴起”在美国清史界受到了新的评价。笔者个人曾指出清代考证学的哲学意义，认为清代汉学运动在中国思想史的内在逻辑发展上显示了一个新的阶段。考证学的主流，虽在说明古书的真伪，古音和文字的来历，及古训之定义，但如此的研究精神也包含了它的哲学意义。例如，考证学的知识组织由于是归纳的及经验的，乃与新儒学（所谓“宋学”）的寻求知识的方法不同。因此，乾嘉学派以为宋学家做主观的学问，比不上考证学家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获取实证的知识。我们甚至可说，考证学的批判态度是儒家思想动摇的初步，并由于考证学有它的哲学内容，而在清代思想史上引起了不少反应。

汉学与宋学之争，从另外的角度看，亦有它的政治意义。因清帝国的儒家政治思想，在理论上与传统经学有不可分的关联、想说明儒教给与科举制度及几个政治变革运动的影响如何，仍得理解五经在儒家传统的思想作用。今文经学的复活，及它的政治内涵，也是清代汉学研究的产物。总而言之，清代思想史显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转变。

三、结语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笔者与美国清史学界的同人，对中国清史研究有关的学者表示致敬和感谢。由于近年来学术交流的机会开始增多，使得双方的同行能交换意见，因相互学习而获益良多。若将来两国之间的交换计划能够继续，相信美国清史研究状况会发展得比以前更快。这次笔者只能稍微介绍几个主要的研究趋势，而不能详细说明全部状况，若读者有任何看法或建议，请不吝指教。